

张伯驹：予所收蓄，永存吾土

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《诗经》，曾用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来形容君子。张伯驹先生，就是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君子。他所代表的，是中国文人的博雅通脱，更是一种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、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崇高的爱国情操。

2018年4月8日 故宫武英殿
仲春时节，“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”——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这里举办。人们在“法帖之祖”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件传世名人手迹晋陆机《平复帖》前，紧贴着玻璃安静地欣赏；排成长队，只为目睹伟大诗人李白的稀世墨迹《上阳台帖》。微信，使这个时代人人都懂一点书画，只听得有人在旁边小声嘀咕，“当年用四万大洋买的”……

1982年初 北京莫斯科餐厅
黄永玉邂逅了垂暮之年的张伯驹。那时候慢，一个印象可以留存近十年。1991年，黄永玉画了一幅小画——《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》，在画的上方，用细密的字记录了当时的场景：
“某日余偕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，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，孤寂索寞，坐于小偏桌旁。餐至，红菜汤一盆，面包四片，果酱小碟，黄油二小块。先生缓慢从容品味。红菜汤毕，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，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，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……老人手中之面包即为其夫人(潘素)带回者。”
很难想象，那就是曾用四万块大洋入手《平复帖》，二百余两黄金购得《游春图》，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几乎全部国宝捐献的张伯驹先生。
“富不骄，贫能安、临危不惧，见辱不惊。”黄永玉评说。

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”

“公子齐名海上闻，辽东红豆两将军。中州更有双词客，粉墨登场号二云。”这首诗，说的是当年的民国四大公子。其中，“中州双词客”之一，便是“九岁能诗，人称神童”的张伯驹。
他，出身于一个大官僚家庭，成年后进入军界，目睹当时官场腐败之状，决心辞去一切挂名差事。
1927年是张伯驹人生转折的一年。他从琉璃厂购得康熙御笔“丛碧山房”匾额一块，并把自己的宅院更名为丛碧山房。
“三十以后，嗜书画成癖。”张伯驹说。在书画中，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：
“每于明窗净几，展卷自怡。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，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。陶熔气质，洗涤心胸，是烟云已与戎相合矣。”
根据张伯驹所撰写的《丛碧书画录》，他在1960年以前共收藏书画一百一十七件，其中宋元及之前的藏品共三十件，占他所有藏品的约四分之一。
宋元及之前的书画，“年代湮远，非经多见广不易鉴别”，是衡量一个收藏家眼力、实力和地位的重要因素。
张伯驹是怎样养得他鉴定眼力的？据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员郝炎峰介绍，张伯驹的功夫，一方面来自他的文化修为，一方面也与他独特的鉴定方法有关。
以唐寅的作品《行书诗》为例。有人曾以其中的“扬州”写为“杨州”而断为伪作。张伯驹却认为：“扬者为杨，抑者为柳，扬杨本系一字”，所以并非唐伯虎误写。他进而评论道：“未学小学而论字，误以断名迹真伪，岂不甚谬。”(《丛碧书画录》)
张伯驹对书画作品的“流传有绪”

很看重，认为文字和文献的著录是前人眼光和经验的总结。此外，他还会从笔法、材质、皴法、内容等多方面考证。
除了鉴藏的眼力，热情也是张伯驹成为大收藏家的必要条件。53岁那年，张伯驹入手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卷，自述“为之狂喜，每夜眠置枕旁，如此数日，始藏贮篋中”(《春游琐谈》，并改字号为“好好先生”。他对书画的爱好，早已达到“痴”的程度。
启功先生曾评说，张伯驹是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。”从本次展品的量级来看，绝非吹捧：
晋陆机《平复帖》，“法帖之祖”，早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百余年；
隋展子虔《游春图》，中国山水画最早期的作品；
李白《上阳台帖》，落笔天纵，意义非凡；
杜牧《张好好诗》，杜牧仅存的墨迹；
范仲淹《道服赞》，文醇笔劲，既美且箴；
蔡襄《自书诗》，宋四家之一，蔡书之最精者；
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，“自明以来已誉为黄书第一”；
宋徽宗《雪江归棹图》，“布置精密，笔意超绝”；
唐伯虎《王蜀宫妓图》，工笔重彩，“书画俱为精绝”；
……

“故予所收蓄，不必终予身为予有，但使永存吾土，世传有绪”

“不知情者，谓我搜罗唐宋精品，不惜一掷千金，魄力过人。其实我是历尽千辛万苦，也不能尽如人意。因为黄金易得，国宝无二。我买他们，不是为了钱，是怕它们流入外国。”张伯驹曾说。
据家人回忆，为保住文物，张伯驹有过一段段惊心动魄的经历。
卢沟桥事变前一年，听说画家溥心畲所收藏韩幹《照夜白图》卷被上海商人叶某买去，张伯驹深怕图卷被转手出境，急忙电函当时主政北京的宋哲元，但为时已晚，图卷被叶某转售英国。
《平复帖》真迹，张伯驹在湖北赈灾书画展上见过，担心重蹈覆辙，立刻托人和溥心畲说，不要再使其流出国外，并请转让。但溥当时要价二十万，并未谈成。1937年，得知溥心畲遭遇母丧，正在筹款，张伯驹便抓住机会，以四万元购得此帖。
1941年秋天战乱，张伯驹全家人陕西避难。途中，他将《平复帖》缝入衣被，虽经跋涉离乱，始终不离身……
1946年，散失东北的清宫旧藏书画陆续出现在市场上，其中，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被文物商人马霁川以低价买入。张伯驹担心国宝被售出国外，立即找人问马霁川，不想却被索价八百两黄金，没能成交。
后来，听说马霁川要以两万多美元将画卖到海外，情急之下，张伯驹“售出所居房产付款”(《春游琐谈》)。所售房产，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，占地十五亩，原为李莲英的宅子。后来马霁川节外生枝，借口金子成色不够，要再追加二十两。万般无奈，张伯驹求请夫人潘素把首饰卖了，才保住这件国宝。
还有更惊险的一幕。因张伯驹收藏字画声名在外，1941年竟被绑架。绑匪要价三百万，并以“撕票”威胁潘素。

张伯驹托人叮嘱夫人，宁死魔窟，也决不许变卖所藏。
僵持近八个月，绑匪见敲诈无望，自动将身价降到四十万。家人多方奔波借贷后，才使张伯驹脱离匪窟。
“予之烟云过眼，所获已多。故予所收蓄，不必终予身为予有，但使永存吾土，世传有绪。”张伯驹曾在其所著的《丛碧书画录·序》中，吐露了他收藏的初心。
遇到开明的政府，将其捐献，让更多人鉴赏到传统书画，更是张伯驹的愿望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张伯驹致信周恩来总理：“在国民党时期，曾对家人潘素立有遗嘱，谓我所藏主要珍品，遇人民爱戴，政府休明之政府，应不以自私，捐归公有。”1956年，张伯驹和夫人潘素从30年蓄藏的书画中选出八件书法精品无偿捐献国家，后由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。
“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，不用操心。”张伯驹说。
捐献义举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。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(茅盾)特地为他们颁发了褒奖状：“张伯驹、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《平复帖》卷、唐杜牧之《张好好诗》卷、宋范仲淹《道服赞》卷、蔡襄《自书诗》册、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等共八件捐献国家，化私为公，足资楷式，特予褒扬。”
据女婿楼宇栋回忆，张伯驹认为这是平生最可欣慰的一件事。
“分手脱相赠，平生一片心。”红学家、史学家冯其庸在其回忆张伯驹的文章中写道，收藏家的一个共同点是“子子孙孙永宝之”，张伯驹能将其捐献，足见他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怀。
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评价张伯驹说：“他所代表的，是中国文人的博雅通脱，更是一种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、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崇高的爱国情操。”

一生半在春游中

在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眼里，他是个略带顽皮的小老头、老小孩：
他会为了想吃一个桃子没有如愿，就坐在地上耍赖；
他喜欢波斯猫，家里一直养着几只波斯猫，常在院里嬉戏；
他让外孙春天在小院上牵牛花，一到盛夏，花香四溢……
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《诗经》，曾用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来形容君子。张伯驹先生，就是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君子。
君子坦荡荡。
红学家、诗人周汝昌回忆，他在燕园读书期间，张伯驹居住在展春园(因收藏展子虔《游春图》而得名，今北大承泽园)。“每日下午课余，常闲步而造园，入厅后，自寻座，宾主往往不交一言，亦无俗礼揖让之烦。我由此深知，先生为人，坦荡超逸，潇洒天真，世所罕见。”
君子爱才交友。
文物专家、鉴赏家王世襄回忆，他与张伯驹相识较晚，1945年由重庆来北京，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，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见张伯驹。研究中，他带着被婉言谢绝的准备，想从张伯驹处借阅《平复帖》。不想张伯驹说：“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《平复帖》太麻烦了，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。”

“那时我们相识才只有两年，不能说已有深交。仅此就足以说明伯驹先生是多么信任朋友，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想做一点有关文物的工作，是多么竭诚的支持!”王世襄感叹。
君子举案齐眉。
20世纪的中国，有几对著名的夫妻，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着惊人的默契和爱好，为人所艳羡。钱钟书和杨绛是一对，张伯驹和潘素也是一对。
潘素在她追念张伯驹的文章中写道，张伯驹重金购买书画的爱好不为他的家人理解，说他是败家子，但她就要不惜一切来支持他。张伯驹教她画画，看到她日有长进，首先是高兴，同时更不甘落后，也奋发写作，并请不少名家前来赏评两人的作品，共同策励。
楼开肇回忆，张伯驹和潘素有着惊人的默契，平日在生活中，要么切磋棋艺，要么一人画画一人题诗。如果两人分开几日，总要填几阙词，表达思念之情。
画家刘海粟曾评价说，张伯驹是“京华老名士，艺苑真学人”，从他广袤的心胸，涌出了四条河流，那便是书画鉴藏、诗词、戏曲和书法。
王国维说：“词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……故后主之词，天真之词也。他人，人工之词也。”在冯其庸看来，张伯驹无半丝虚伪造作，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真人，因而能作得好词。周汝昌更盛赞，“如以词人之词而论，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，而以先生(张伯驹)为殿——在他之后，恐怕不意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。”
有词为证。张伯驹曾写过一组《浣溪沙》咏秋(共六首)，其中的《前调·秋影》这样写道：“霜萧萧独倚阑，帘波掩映夕阳前，西风相对总无言。一叶梧飘穿云破，数行雁过印江寒，画桡不点镜中天。”
如今说到票友，多是捧场子看戏的人，虽然偶尔唱上两句，也少有专业水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张伯驹可算京剧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票友。
据多年从事戏曲史研究的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讲述，张伯驹过四十岁生日时，在北京隆福寺的福全馆举办了一场大型堂会演出，大轴是《空城计》。张伯驹自演诸葛亮，杨小楼配演马谡，余叔岩配演王平，程继仙配演马岱，王凤卿配演赵云。
杨小楼、余叔岩、程继仙、王凤卿等都是平常单挑班的了不起的大佬，或是息影舞台多年的名角儿，这四个人给张伯驹配演四将，是绝无仅有的盛况，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”。
中国的书法史上，有几种很有个性的书体。宋徽宗的“瘦金体”是一种，张伯驹的“鸟羽体”也算一种。刘海粟评价张伯驹的字时说：“运笔如春蚕吐丝，笔笔中锋，夺人视线，温婉持重，飘逸酣畅，兼而有之，无浮躁藻饰之气。目前书法，无人继之。”
张伯驹精通围棋，因此和陈毅元帅成为至交和棋友。陈毅逝世前，嘱咐将他的玉质棋子送给张伯驹。张伯驹听闻元帅逝世，挥泪写了挽联：
“仗剑从云，作干城，忠心不易，军声在淮海，遗爱在江南，万庶尽衔哀，回望大好山河，永离赤县；挥戈挽日，接樽俎，豪气犹存，无愧于平生，有功於天下，九原应含笑，伫看重新世界，遍树红旗。”
两颗爱国心，紧紧相扣。
(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